

洛阳新出土隋《安备墓志》考释^{*}

毛阳光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洛阳市 471022)

关键词: 洛阳 安备墓志 粟特人

KEY WORDS: Luoyang An Bei's epitaph Sogdian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An Bei's Epitaph of the Sui dynasty is the only epitaph for a Chinese Sogdian ever found in the Luoyang area. It recorded how An Bei's ancestors came to Luoyang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how An Bei and his father served the Northern Qi court. Although An Bei was good at business, he followed the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s of filial piety,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believed in and practiced Zoroastrianism.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hinese Sogdians were under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conduct. The epitaph also demonstrates a shared desire among Chinese Sogdians who were eager to enter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become part of it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安备墓志》是近年出土于洛阳的隋代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此后该墓志以及墓葬中相关文物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收藏,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葛承雍率先对该墓志做了研究,考证了安备的家世和仕宦经历,指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后裔。文章还对安备墓出土石榻上具有祆教色彩的图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对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中祆教的传播进行了重新认识^[1]。另外,该墓志拓片曾在“2009年洛阳第二届民间收藏精品展”上展出,拓片图版还收入了《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一书^[2]。该墓志铭共18行,每行18字,共315字,魏体,有界格。字数虽然不多,但其中蕴含的历史讯息却非常丰富。这里笔者服膺葛氏文章对于祆教石榻以及安备祆教信仰的分析考证。只是葛氏文中该墓志铭的录文及相关考证尚有可议之处。而笔者长期从事洛阳隋唐外来移民研究,故结合洛阳以往出土的石刻史料,对于安备家族及其仕宦经历以及晚年生活、安葬地点再做考释,庶几对该问题研究有所补益。墓志铭全文如下:

故开府长兼行参军安君墓志铭/

君名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父知识,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武/平之末,齐许昌王莫府初开,牒为长兼行参军/。一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恭奉。时辈/之中,谦直逊顺。屡展懃诚,渐望昇进。但事与愿/远,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之第。君便义绝/遂还旧庐。敛志东归,归田二顷。忽萦疾,医僚无/工。大命运穷,奄从朝露。时年卅有四,以大隋开/皇九年岁次己酉十月辛酉朔廿四日甲申葬/于澗水之南、张分桥侧。恐山壑时移,乃为铭曰/:

门标贵胄,世代高良。比兰斯馨,警蕊能芳。弱冠/释褐,奉事君王。年始过立,奄归元常。

据墓志记载,安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阳城北魏属阳城郡,隋初属河南郡,治所在今天河南登封市东南的告成镇。安备“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认为,

*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厅2008年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北朝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外来文明研究”的前期成果

中古时期汉地的安姓都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城邦国家——安国，其具体位置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安国在北魏时代称为忸密，《魏书》卷102《西域传》载“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斤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3]忸密早在北魏时期就曾向北魏政权朝贡，《魏书》卷8《世祖纪》记载“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春正月，忸密和其他西域国家遣使朝贡”^[4]。到了隋唐时代，忸密在史书中被称为安国。如《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记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密者。”^[5]据记载，玄奘西行取经经过这里时，中安国称喝捍国，西安国称捕喝国，东安国称屈霜你迦国^[6]。墓志中安居耶尼国应该指的就是安国，只是这个称谓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过，属于仅见。

自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中原政权和西域关系的日渐密切，许多西域胡人已经来到了洛阳。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安姓粟特人早在西晋年间已经居住在当时的洛阳城了。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偃师首阳山镇北的邙山上发掘了西晋支伯姬墓，墓中出土的墓志砖铭文曰“永康元年二月廿一日安文明妻支伯姬丧”。支伯姬应是月氏人，永康是晋惠帝年号，即公元300年，安文明此时就居住在洛阳^[7]。只是永嘉之乱后，北方陷入长期的战乱，洛阳遭到严重破坏。北魏时期，随着北方的统一，北魏国力日趋强大。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开始经营西域，他数次遣使臣出使西域，北魏与西域的交往逐渐频繁。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日趋繁荣的洛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西域使臣前来朝贡，所谓“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8]因此来到洛阳的西域人数量相当大。《洛阳伽蓝记》卷3记载了当时胡族来华的盛况，“自葱岭已西，至



图一 安备墓志拓本

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洛阳出土的《鄯月光墓志》记载鄯月光是车师国前部王车伯生儿子的妻子，既然鄯月光葬于洛阳，车师王子当然也居住在洛阳^[9]。《鄯乾墓志》记载其是鄯善王鄯宠的孙子，其父鄯视在太平真君六年归附北魏，因而他们成为洛阳洛滨里人。鄯乾就在北魏做官，先后任员外散骑侍郎、城门校尉、安定内史等职，鄯乾死后葬于洛阳邙山，鄯月光和鄯乾都是西域鄯善国来到洛阳的贵族^[10]。北魏文成帝的妃子于仙姬“西城（域）宇闐国主女也”则来自于闐国^[11]。虽然目前洛阳还没有发现北魏进入洛阳的粟特人墓志，但从洛阳以往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的追述来看，这一时期来到洛阳的粟特人数量也不少，如《康婆墓志》载“本康国王之裔。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12]《安静墓志》载“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周南指的就是洛阳，说明其祖上也是在北魏时期来到洛阳

的^[13]。

而《安备墓志》记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则安备先辈也是在北魏时期来到洛阳的粟特人，正因为如此，他担任了典客的职务。北魏有典客署，其长官是典客监，负责接待外来使臣、蕃客的职官。或许安备祖上就是前面提到的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来到洛阳的，并在典客署任职。安备的父亲安知识，史书无载。据墓志记载，他曾任北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车骑大将军职位很高，属二品。关于直荡都督，在北魏、北齐隶属禁卫军系统的左右卫府。直荡都督是其属官，为从四品^[14]。是禁卫军中步游荡队和马游荡队中的将领^[15]。安知识爵位是千乘县散男，散男是北齐爵位中的最后一等，品级是从五品下。

有趣的是，墓志记载安备“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说明安备家族虽然是胡人，但是他自认已经在汉地生活了很久，受到汉地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汉化和当地的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后一句典出《荀子·劝学》，用在这里表明当时入华粟特人的心态。安备“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白圭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商人，玄高即弦高，则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商人，两人都以经营商业而闻名，这表明安备有商业经营才能。众所周知，位于中亚交通要冲的粟特人就是以经商而著称的群体，《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记载粟特地区的康国人，“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16]而玄奘也指出这里“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17]结合前面墓志的记载，笔者颇疑安备家族就是一个粟特商人家族，安知识也可能是胡商。北齐后期，胡商与上层统治者关系密切，颇受信用，许多胡商因此进入北齐政权的上层，安知识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安备对于商业却并不感兴趣，甚至放弃了这个职业。反而是“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他非常孝敬父母，在地方上孝悌之行颇著，以至于被认为是“龙驹”、“指南”，成为地方上的才俊和楷模，

说明安备尽管有商业的背景，但在行为方式上却受到儒家深深的影响。

据墓志记载，北齐末年的武平年间，“许昌王莫府初开”，莫府即幕府，而墓志中的许昌王史书失载，而葛氏前引文亦失考。但爬梳史料，许昌王是有踪迹可寻的。据洛阳出土的隋《冯忱妻叱李纲子墓志》中记载其祖“长叉，齐侍中、许昌王，周少司徒，隋信州总管、相州刺史、上柱国、新宁密公。”^[18]叱李又作“叱列”，《北齐书》卷20《叱列平传》记载其子长叉“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新宁王。”《北史》卷53《叱列平传》也有相同记载。赵万里根据前引墓志援引《隋书》卷2《高祖纪下》开皇十七年诏令中“新宁公长叉”的记载，指出《北齐书》本传中将叱李长叉随朝的封爵误为北齐末年所封。对于叱李长叉在北朝隋初的宦迹，赵万里考订甚详，可参看^[19]。由此确证，叱李长叉在北齐武平年间的封爵应是许昌王。另外，洛阳师范学院近年收藏葬于开元六年（718）的《唐臧君夫人临海县君叱李氏墓志》记载其先祖“长叉，齐尚书令，周大司徒，封许昌王。”^[20]长叉即长叉之误，尽管墓志对叱李长叉在北齐、北周的仕宦情况由于时间久远而有误，但其曾封许昌王应无疑义。这样《安备墓志》中提及的许昌王就是叱李长叉。叱李长叉开府置僚属之后，可能由于安备品行出色，他被任命为开府长兼行参军。这样安备进入了仕途，根据后面安备的卒年推断，其在武平末年正好20岁，因而墓志铭中说他“弱冠释褐”。根据北齐官制，开府长兼行参军为从八品，地位并不高^[21]。有意思的是安备虽出身商胡，但在叱李长叉幕府却勤勤恳恳，表现出色，因而墓志记载“一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恭奉。时辈之中，谦直逊顺。”此时在叱李长叉幕府担任此职务并非安备一人，据《李元暨妻邓氏墓志》记载，“齐开府仪同叱列长叉坐树论功，盛开莫府。虚襟待士，侧席思人。引君为开府行参军。辞不获免，解巾斯任。”则李元也曾任叱李长叉开府长行参军^[22]。

北周灭北齐后，叱李长叉地位下降，因此墓志载“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之第。”廉之第不可解，或许有脱文。安备也“君便义绝，遂还旧庐。”而同时代的李元也在此时“毕志丘

园”^[23]。安备本是商胡,并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年纪轻轻就回归田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前引葛承雍文章认为安备去官后生活在阳城,笔者认为证据尚不充分。尽管墓志记载安备是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但并不能因此说明安备去官后就居住在阳城。笔者认为阳城可能是安备先辈进入中原地区的著籍地,著籍地和居住地不相同在隋唐墓志中也是常有的现象。而墓志中却明确记载安备退职后“敛志东羸,归田二顷。”东羸应指东汉洛阳城的东羸圭苑,据《后汉书》卷8《灵帝纪》记载:光和三年“作羸圭、灵昆苑。”注文称“羸圭苑有二,东羸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羸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也。”^[24]据《河南志》记载:东汉洛阳城城东有三门,其中的南门称为耗门,又称宣平门、望门^[25]。这样安备晚年应居住在洛阳城东,而不是登封。

安备去世的具体时间,墓志没有记载。仅记载他在开皇九年(589)十月二十四日被安葬。按常理度之,安备应该卒于此前的一段时间,如以开皇九年计,其卒年仅三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因此墓志铭称“年始过立,奄归元常。”这样他生在北齐天保六年(556)。

由于安备墓志是被私人挖掘出土的,因而葛氏前引文仅提到该墓位于河南某地。实际上安备安葬的地点在墓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即“灏水之南,张分桥侧。”灏水即谷水,葛氏录文“灏”误为“洁”^[26]。北魏时期的谷水从洛阳城西北流入,在洛阳城西北角分流,由此向东、南分流绕城,并有部分支流进入城中^[27]。而墓志中提到的张分桥是汉魏洛阳城一处非常有名的处所,张分桥位于汉魏洛阳城西清风乡。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载“出阊阖门,城外七里有张分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28]可见这里在汉魏时期是迎送宾客故旧的重要场所。杨衒之在其下小注云:“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张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语讹,号为张夫人桥。”可见,当时此桥就有多种称谓。这在文献和石刻中都能得到印证。如《魏书》卷58《杨椿传》载其告老归乡之时,“群公百僚饯于城西张方

桥”。洛阳出土的《张礼暨妻罗氏墓志》记载张礼夫妇“葬张方桥北二里,却背邙足,前眺洛川。”^[29]从近年来洛阳地区新出土隋墓志来看,此地隋代名称还是多种多样,《张颜墓志》则记载其开皇三年(585)十月葬于张方桥西北二里^[30]。《王夏墓志》记载其在仁寿四年(604)葬于清风乡张方桥冯村之北一里。而《张盛墓志》记载张盛开皇十二年(594)葬于“邙山之南,张分桥之北。”《□光墓志》记载他在开皇元年(583)六月葬于“张夫人桥西北二里”^[31]。实际上都是一地。看来这里是隋代前期未迁址之前洛阳城市居民主要的葬区之一。有意思的是,《张礼暨妻罗氏墓志》与《安备墓志》中所记载的安葬于张分桥附近的时间居然是同一天,即开皇九年(591)十月廿四日。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载《张礼暨妻罗氏墓志》民国十八年(1929)阴历六月出土于洛阳城东大马村东下黄村北^[32]。而前述《张颜墓志》据载出土于洛阳东郊白马寺镇朱村北约三百米。二村相距不远,可见东下黄村向南、朱村东南不远就是古张分桥所在。因此,安备的墓地在当时汉魏洛阳城城西张分桥附近。另外,张分桥所在的洛阳城西是隋代前期洛阳百姓重要的葬区,如隋虎贲郎将关明、洛州宗卫长史杨畅、御仗队副桥绍等都葬在这里^[33]。笔者以为,正因为安备晚年居住在洛阳,他死后葬于城西张分桥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关于安备的宗教信仰,墓志中没有反映。葛承雍根据其墓中出土的石榻上袄教色彩的图案认为安备是一名信仰袄教的粟特人后裔^[34]。笔者认同这一论断。值得关注的是,建国前洛阳曾出土过葬于隋大业十一年(615)的《翟突娑墓志》,翟突娑是来自于粟特地区并迁居到洛阳的胡人后裔,他居住在嘉善里,而翟突娑也具有袄教信仰^[35]。这表明隋代洛阳有一定数量信仰袄教的粟特人,而且洛阳地区粟特移民的袄教信仰一直延续到唐前期。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卷5以及张鷟《朝野僉载》卷3的记载,此时袄教祠庙分布在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等处。粟特人还经常在袄祠举行宗教活动,“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酌神之后,募一胡为袄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袄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

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36]

《安备墓志》是目前洛阳仅见的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粟特人的墓志。安备一生经历北齐、北周和隋三代,其墓志虽然内容简略,却蕴含了丰富的中古时期社会历史文化讯息,揭示了南北朝时期外国移民进入中原地区的生活状态。我们看到:作为一名有商胡背景的粟特人,安备是入华粟特移民的第三代,尽管在宗教信仰上还保持着祆教的信仰。但他已经遵从儒家的孝悌之道,而且不愿意从事本民族所擅长的传统商业经营,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后裔身上多元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北齐上层社会胡风盛行一时,统治者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和物品,一些胡人乐工凭借自己的歌舞技艺,一些商胡则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接近统治阶层并得到他们的宠信,最终获取高位。在北齐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7]。但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胡人而言,他们更多的是逐渐接受中原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汉族为主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这方墓志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普通胡商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汉文化的心态,尤其是墓志中“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表述说明了此时汉地粟特人后裔的自我认知。而绝大多数南北朝粟特人后裔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最终融入了汉地社会。

文章写作过程中承蒙赵振华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 [1] 葛承雍. 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J]. 美术研究, 2009(3).
- [2] 王绣. 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M]. 北京: 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 2009: 126.
- [3] 魏收. 魏书(第102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70.
- [4] 同[3]. (卷8)[M].
- [5]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第22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244.
- [6] 玄奘, 辩机著, 季羨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92-94.
- [7]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偃师商城博物馆. 洛阳偃师西晋支伯姬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9(3)

- [8] 魏收. 魏书: 邢峦传(第65卷)[M]. 中华书局, 1974: 1438.
- [9] 赵力光. 鸳鸯七志斋藏石[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5: 21.
- [10] 赵万里.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12. 魏故征虏将军河州刺史临泽定侯都使君墓铭)[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 [11] 同[10]: 图版38. 大魏文成皇帝夫人于墓志铭.
- [12] 周绍良, 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39)[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96.
- [13] 同[12]. 显庆059. 267-268.
- [14] 魏征等. 隋书: 百官志中(第27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758.
- [15] 张金龙.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6] 旧唐书: 西戎传(第198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310.
- [17] 大唐西域记校注: 窰利地区总述(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72.
- [18] 同[10]. 图版521: 352.
- [19] 同[10](第9卷): 107.
- [20] 唐故戎州都督府司马臧君夫人临海县君叱李氏志石文并序.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石刻艺术馆藏墓志.
- [21] 隋书: 百官志中(第27卷): 769.
- [22] 同[10], 图版507.
- [23] 同[22].
- [24] 后汉书(第8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45.
- [25] 徐松辑. 河南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40.
- [26] 同[1].
- [27] 段鹏琦. 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C]//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28] 杨銜之著, 杨勇校笺. 洛阳伽蓝记校笺(第4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01.
- [29] 鸳鸯七志斋藏石[M]. 175.
- [30] 乔栋, 李献奇, 史家珍等.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14.
- [31] 赵君平, 赵文成. 河洛墓刻拾零[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55, 51, 45.
- [32] 郭玉堂. 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M]. 洛阳: 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 1941: 54.
- [33] 同[29]. 171, 172, 176.
- [34] 同[1].
- [35] 同[29]. 218. 相关研究参: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90.
- [36] 刘焯, 张鹭. 隋唐嘉话·朝野僉载(第3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64.
- [37] a. 万绳楠整理.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黄山书社, 1987: 297-300. b. 毕波. 论北齐宫廷内部及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J]. 文史, 2009(4).

(责任编辑 朱艳玲)